



汉碑篆额分类及书风变迁研究

黄逸伦

(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, 浙江杭州, 311112)

摘要: 现存的两汉时期碑额十分稀少, 因多用篆书书写, 而被广泛地称为篆额, 是研究篆书在两汉时期发展情况的重要资料。两汉篆额在书写构型上大量运用夸张、变形等手法, 线条松动, 具有极强的表现力, 对后来书法艺术与篆刻艺术创作的技法、技巧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本文对汉碑篆额按照时间先后进行了整理, 在对汉碑篆额书风审美特征的分析、分类的基础上, 梳理篆额书风的传承变化以及鉴析两汉时期的篆书艺术, 并对其风格的变迁进行勾勒, 为汉碑篆额书法在当代的复活和传承提供史论支持。

关键词: 两汉, 碑额, 风格变迁, 审美特征

一、绪论

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大发展时期。就篆书而言, 目前能见到的资料除封泥汉印、简牍书迹、瓦当砖文、铜镜铭文和碑刻外, 尚有一定数量以篆书题名的碑额。这些碑额上的篆书作品, 字数少则五六字, 多则十数字, 面目甚多, 给争奇斗艳的汉代书法增添了不少光彩, 也为学习、研究和鉴赏汉代的篆书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。

近些年, 对于两汉碑额的研究, 有不少研究者就代表性的汉碑分析了其立碑年代和篆额文字的特点, 但是把汉碑篆额作为研究对象并作深入探讨的论文并不多见。目前正式出版的有孙伯涛的《两汉刻石碑额》^[1]以及杨频的《碑额志盖书法百品》^[2]两本碑额书法图册, 其中对碑额有较为详细的图解, 但缺乏对碑额书法艺术的专门讨论。相关著论方面, 如华人德《中国书法史·两汉卷》^[3]一文, 仅仅对碑额书法有所提及, 并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述。何应辉在《中国书法全集·秦汉刻石卷》^[4]编纂札记一文中, 则主要研究了东汉篆书并涉及到东汉时期的篆书碑额, 但没有对篆书碑额书法意义及影响的详细论述。陈星平《东汉碑额书法艺术研究》^[5]中, 搜集了大量的篆额实例, 以此对《说文解字》^[6]、汉印、简牍类和篆额的文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, 指出了《说文解字》和其他遗例之间的不同点, 但并没有阐述篆额总体的倾向。还有杨频《飞腾天矫: 东汉碑额书法艺术赏鉴》^[7]

和《汉魏两晋南北朝碑额志盖书法研究》^[8]，刘清扬《两汉碑额书法艺术试论》^[9]，王银忠《略论汉代碑文之碑额题尊》^[10]，王渊清《汉碑额的艺术特色及其影响》等研究都存在类似的问题。

本文试图在前人基础上，尝试对篆额书风进行重新分类，并对其风格变迁的路径进行梳理研究。

二、书风概况

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碑，竖石也。”春秋时期，碑开始出现，郑玄曰：“宫必有碑，所以识日景、引阴阳也。”可见最早的碑虽被广泛应用于宫庙、墓葬中，却无刻文。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在全国巡游、祭祀，所到之处必勒石篆文，秦人呼为刻石，不曰碑，但也大大提升刻石的地位，此后石刻文献开始广泛称为碑。到西汉初期，文字还是承袭了“秦书八体”，小篆依旧是较为通行的书体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儒学成为学术之宗，社会尚文的风气使得树碑铭文成为一时之风尚。另一方面，秦汉时人葆有死后重生的观念，遂崇尚厚葬，以考古材料来看一大批碑刻文献也出土于墓葬。虽然秦汉时，隶书字形发展已经成熟，并作为法定书写形式而被广泛地应用于官方文书中，篆书失去官方文字的地位，但因其古雅仍为上层知识分子学习，有其特别的审美和文化高点的意义。所以，在重要的官方文书及重要仪典的书写，还有碑额、宫殿的砖和瓦当等都有篆书的身影，且书写之人地位尊显，能因字数对部分碑额形制、面积做相应处理，手法多样，风采独具。因此可以说汉碑额篆书是汉篆中独树一帜的一种，遥领了汉代篆书的独特风采。

在为数不多的现存两汉时期的碑额中，篆书碑额的数量占绝对优势，题名碑额篆书相当常见。这一时期的碑额篆书是秦代小篆的延伸和转化，一方面继承了秦篆风格，另一方面与秦小篆的工艺性、标准规范的特征又有着较大的区别，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极强的艺术性。虽从存世的史料记载，汉碑篆额较为稀少，但仍无法撼动其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三、审美特征与分类

（一）审美特征

两汉篆书碑额存世稀少，从保存至今的碑额实物来看，风格古朴、用线厚重，节奏变化快速明晰，生动灵活，大量使用变形与夸张等带有装饰性的艺术处理手法。通过对现有两汉时期篆额的考察，笔者发现，两汉时期碑额篆书具有如下审美特征：

①体势宽博灵动

两汉的篆书较秦篆更为朴实浑厚，两者相比，汉篆用线的浓厚庄重是秦篆难以望其项背的。而且，汉篆的结构宽博，体态松动，较秦篆的严谨整齐，汉篆更显生动。

②造型夸张巧变

秦代小篆的笔画粗细均匀，字形基本呈长方形，重心偏上，而两汉篆碑，由于书写区域的独特性——碑额狭小，很多字体的结字需要随书写区域的来布局。所以，在单字处理上，碑额上的篆书长短、大小、方圆往往不定，从而形成夸张变形的体势。碑额上的篆书有时还会借鉴自然物象的“垂露篆”、“悬针篆”等风格，抑或是印章中摹印风格，真可谓巧变迭出，千姿百态。

③笔法篆隶互用

书法在各种书体定型之前，书体演变都是以一种新的书写形态诞生为标志的，在每一种新形态逐渐形成的过程中都有一个中间形态。两汉时期的篆额就是篆书向隶书转变的中间形态。笔法上除

了常用的平移推动的轨迹外，也增加了提按上下运动的轨迹，出现波磔的意味。这种中间形态必然会兼具两种书体的某些共同特征。两汉时期已通行隶书，当时的人对篆字已经比较陌生，所以篆额中也常见隶书的字形特点。

由此可见，两汉篆额是篆书向隶书演变的中间状态，虽不定型，却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。其审美特征并不是孤立的，而是互相兼容的。

（二）分类

本文结合以上审美特征，将汉碑篆额分为类秦篆、汉篆、“垂露”篆、“倒薤”篆与方笔篆五大类。

类秦篆类碑额是接近秦代的《泰山刻石》的小篆，书写文字也大致与《说文解字》类似。线条较细，粗细变化微弱，横画与纵画用简单的直线构成，曲线部分线条圆润、浑厚、弧度较大。结构上横画之间的间距较大。例如：《李昭碑额》、《王君碑额》（图1）、《樊敏碑额》。

汉篆是在汉代产生的其特有的篆书。汉篆类碑额的笔法承接秦小篆，线条匀停婉转，结体宽博圆融，疏密有致，体势上与摹印之缪篆最为相近。例如：《北海相景君碑额》、《袁博碑额》、《韩仁铭碑额》（图2）。

“垂露”篆是一种以自然物象命名，代表秦篆装饰化风格的篆书。“以书章奏，如悬针而不纤，若浓露之垂，故名。章帝尝重此书，比之金盘泻珠，风篁杂雨，蔡邕所谓建初称善者也”。学界基本认为垂露篆是汉代曹喜所创。“垂露”篆系碑额体态趋长似秦小篆，姿态妍媚婀娜，用笔圆和流畅，收笔如垂露。如：《孔宙碑额》、《赵葑碑额》、《王舍人碑额》（图3）等。

“倒薤”篆相传是殷商隐士务光偶见风吹薤叶“交偃成文”的景象，得到启发，创制此书。此种篆书“结体皆上敛下舒，垂笔中截丰满，结尾出锋尖细，清俊飘逸”。例如：《西狭颂碑额》、《尹宙碑额》、《赵宽碑额》（图4）。

方笔篆类碑额有很重的隶化痕迹，以隶法写篆意，篆隶之间而屈曲饱满，用笔上多用方笔，除部分保留篆书的圆转弧线之外，增加了方折用笔，但若方若圆。结体上端庄稳重，劲健挺拔，然不呆板。例如：《嵩山泰室石阙铭额》、《鲜于璜碑额》、《张迁碑额》（图5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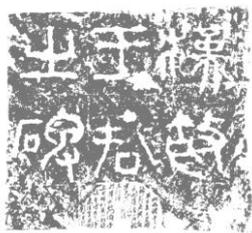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《王君碑额》



图2 《韩仁铭碑额》



图3 《王舍人碑额》



图4《赵宽碑额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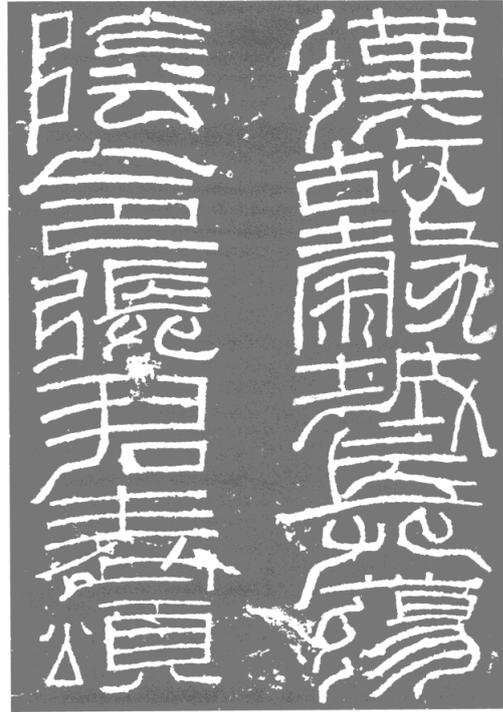


图5《张迁碑额》

四、书风变迁

通过立碑的年代可以看出，属于类秦篆类的篆额可以说是篆额的主流。大多数例如《王君碑额》一类的类秦篆类的篆额文字，字形构造类似于《说文解字》中的传统篆书。到了汉代末期，篆额书写风格开始趋向稳健有趣，这些特点保留在《白石神君碑额》等魏碑中，类似倾向也可通过隶书碑额来观察。后汉建元三年（公元 170 年）之后，即使在隶书碑额的书写中，也表现出魏碑稳健的书写风格，在《营陵置社碑额》（图 6）、《校官碑额》（图 7）、《赵君碑额》（图 8）诸碑中均可体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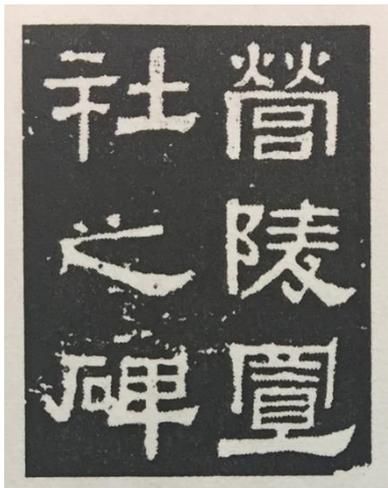


图6 《营陵置社碑额》



图7 《校官碑额》



图8 《赵君碑额》

同样的，在砖文中也能看到此类书写风格。关于前汉至后汉砖文书写风格的变化，分析如下：

从时间上而言，各个时期的特点：第一期地节二年砖（公元前110年-公元10年）（图9）主要以小篆为书写的主体；第二期建初元年砖（公元10年-公元110年）（图10）文字图形化，装饰性强且书写风格多样；第三期建安二年砖（公元120年-公元220年）（图11）接近于隶书系砖文的古隶风，向直线型、方正的字形转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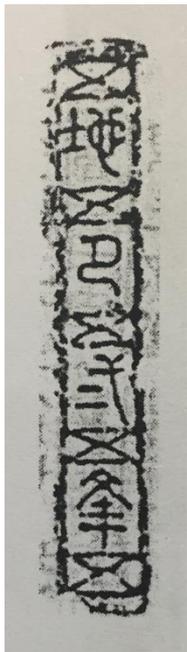


图9 地节二年砖



图10 建初元年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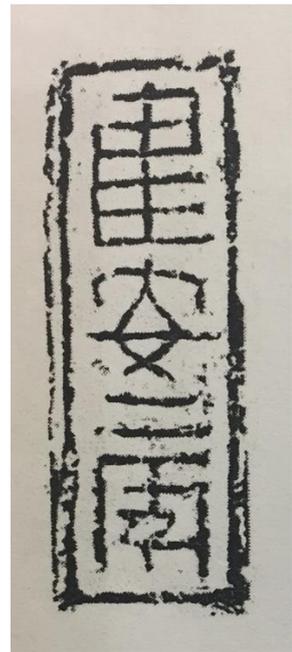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1 建安二年砖

章法上呈现出“笔画间严密的间隔留白优先，文字重心随数量不同而发生变化”的特点。随时代推移，篆额中出现了从类秦篆类向汉篆类的风格变化。通过观察图9-11砖文的整体构造可知，字数增加，出现了两行或者三行，内容复杂化。到了汉代后期，部分砖文专注于单字的变化，字形方形化，书写风格变得稳健，该书写风格已成为主流。

与此同时，汉篆类篆书受到了以横画为中心的隶变影响，使得文字内部产生了疏密上的对比，

赋予了线条生动的表情。另外，如同第二期建初元年砖（公元 10 年-公元 110 年）一样，在砖文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在方框内的间隔留白上下了功夫，已经萌发了美的意识。这些可以称之为汉篆的成熟期，在《尹宙碑额》、《赵宽碑额》等公元 170-180 年建的碑中有所体现。

另外，文字重心对比的变化不仅只体现于文字内部，在篆额整体的疏密关系上同样适用。可以得知当时不只考虑单个文字，字和字之间非常紧凑，而更注重篆额整体的布局。而且，通过字里行间一定的留白，使文字间的凝聚感变得更加鲜明。此类风格倾向在《韩仁铭额》、《王舍人碑额》、《张迁碑额》等碑当中得以体现。在《韩仁铭额》中，可以看出“意”、“长”、“韩”这三个字整体表现协调，如同一个字；《张迁碑额》各个字之间也极为协调统一，呈现出了篆额整体的美感。

以上特点也在前汉的枢铭以及墓题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见《永元二年画像石墓题记》（图 12）、《郭夫人画像石墓题记》（图 13）和《冀州从事冯君碑额》（图 14）。需要强调的是，《校官碑额》的立碑年代接近于《韩仁铭额》、《王舍人碑额》、《张迁碑额》的立碑年代，而《冀州从事冯君碑额》是在带有碑文的石碑建立的初期。由此认为，制作碑额之时人们可选择使枢铭和墓题记中的文字重心产生变化、寻求一体化的技法，或是选择文字重心统一排列的典型技法。例如《王舍人碑额》文字重心的类型属于传统的统一型，而各个字的书写则属于典型的汉篆；《韩仁铭额》是根据汉篆类篆额各个文字间的疏密关系调整文字重心；《张迁碑额》也运用了这一技法。由此得知，自由地选择章法在当时成为了一种可能。



图 12 《永元二年画像石墓题记》 图 13 《郭夫人画像石墓题记》 图 14 《冀州从事冯君碑额》

五、结论与展望

汉代的篆书主要以缪篆为主，带有时代烙印，整体上表现出与秦篆不一样的特点。两汉碑额篆书是汉篆重要的书写形式，使用的字形仍属传统的篆书，其形式多变，风格多样，字数较少，空间较小，但具灵活的特点，即不按固定模式书写。在秦、汉篆书的基础上多有创新，代表了汉代篆书的水平和风貌。

汉碑额篆书因其字法特点与汉印摹印篆有高度的相似之处，入印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和可行性，故作为一种印外文字，为篆刻家提供了习篆、入印文字素材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孙伯涛. 两汉刻石碑额[M]. 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2.
- [2] 杨频. 碑额志盖书法百品[M]. 西安:世界图书出版公司, 2007.
- [3] 华人德. 中国书法史两汉卷[M]. 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 2001.
- [4] 何应辉. 中国书法全集 秦汉刻石(一、二)[M]. 北京:荣宝斋出版社, 1993.
- [5] 陈星平. 东汉碑额书法艺术研究[M]. 北京:文津出版社, 2012.
- [6] 许慎撰. 说文解字[M]. 天津:天津市古籍书店, 1991.
- [7] 杨频. 飞腾夭矫:东汉碑额书法艺术赏鉴[J]. 书法, 2008(05):81-84.
- [8] 杨频. 汉魏两晋南北朝碑额志盖书法研究[D]. 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, 2006:11-12.
- [9] 刘清扬. 两汉碑额书法艺术试论[J].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04, (6):130-133.
- [10] 王银忠. 略论汉代碑文之碑额题尊[J].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06, 25(1):60-61.

作者信息

姓名: 黄逸伦

性别: 女

出生年月: 1992.04

籍贯: 浙江东阳

工作单位: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

毕业院校: 中国美术学院

学历: 硕士研究生

专业: 书法与篆刻

主要研究方向: 篆书书风研究、隶书书风研究、碑额书法风格研究等。